·综　述·

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及其应用研究

程凤杰[1,2]，李晶[1,2]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49

摘　要： 近年来，儿童外化行为问题频繁发生，而早期养育干预则能改善儿童外化行为。二元亲子互动编码（DPICS）是能有效测量 3～8 岁儿童家庭亲子互动质量、评估和指引亲子互动干预的循证工具。本文以 DPICS 的应用研究脉络为基础，综述其应用情境及影响机制，以期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关键词： 儿童外化行为问题；亲子互动；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

中图分类号：B844.1；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4)02-0159-05　doi:10.11852/zgetbjzz2023-0483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CHENG Fengjie[1,2], LI Jing[1,2]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ng, E-mail: lij@psych.ac.c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arly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 is a validated, evidence-based tool for assessing and guid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ged 3 - 8 year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interventions using DPICS, aiming to provide richer evidence for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Keyword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parent - child interaction;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频繁上热搜榜的“熊孩子”，是典型的外化行为问题。行为问题是对同伴、成人或环境表现出的冲动性和不顺从性，其范围从相对温和的行为，如脾气暴躁和轻微的反抗，到更严重的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1-3]。儿童的行为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在经历个人需求和环境的冲突中逐步形成的[4-5]。父母是儿童整个成长期的最大影响者。父母养育行为不但影响儿童的认知能力、学业成绩，更能影响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品德的完善及人格的发展[6]。父母惩罚性或不稳定的管教、父母态度冷淡等消极的亲子互动和专制的养育方式，都是儿童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风险因素[7-8]。众多研究证据表明，积极的养育行为是预防和治疗儿童行为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9-12]。

随着对养育行为的关注和研究，随之发展的是对养育行为的科学测量。目前，测评工具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问卷调查表，可以是自评或者是他评；另外一类是观察法，其包含自然观察法和实验室观察法。观察法可以避免由自评或者他评带来的偏见，同时针对治疗和干预带来的变化监测也会更加敏感，还可以很好地解决年幼儿童无法进行有效报告的状况[13]。

Cañas 等[13]（2020）评估了适用于 0～12 岁、基于养育行为的 16 种亲子互动质量观察工具，其中适用于 3～8 岁儿童的工具主要是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DPICS）。该编码系统通过对亲子互动游戏环节的观察，量化父母和儿童的言语行为、儿童顺从性等，以评估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儿童的顺从与合作性，用作干预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可以适用于实验室和自然生态环境（如诊所、家庭）[14-15]。DPICS 已广泛应用于美国、西班牙、英国、墨西哥、瑞典、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15-23]。

本文以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DPICS）作为研究基础，分析了近期以 DPICS 为依托的养育行为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971009）；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的资助（2021082）

作者简介：程凤杰（1980-），女，苏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外化行为问题。

通信作者：李晶，E-mail：lij@psych.ac.cn

预研究，综述了 DPICS 的应用情境，及 DPICS 测量到的积极养育行为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作用机制，为提高亲子互动品质和减少儿童外化行为问题提供参考。

1 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是基于证据的养育行为量测工具

DPICS 是 Eyberg 等[16]于 1974 年在美国首次发布，根据研究和编码者的反馈，DPICS 经历了不断的完善和修订，以提高其效用和编码者之间的可靠性，最新版 DPICS-Ⅳ于 2013 年发布。DPICS-Ⅳ包括 3 个标准化的亲子互动情境和一个编码系统。在简短的热身游戏之后，以 3 个结构化的序列亲子互动游戏情境展开：儿童主导的游戏（child-led play，CLP），父母主导的游戏（parent-led play，PLP）和玩具清理（clean up，CU），每个情境持续 5min。在 CLP 情境中，要求父母跟随儿童的需求。在 PLP 阶段，父母被指示让儿童按照父母的指令一起游戏。在 CU 阶段，父母要求儿童清理游戏中的所有玩具[15]。三段亲子互动游戏结束后，研究人员依据现场录像资料和编码系统，对养育者和儿童的行为类别和频率进行量化统计。DPICS 标准手册有三大类编码条目：1）父母和儿童的言语类别（如“称赞”、“命令”和“负向语句”等）；2）身体接触（主要分为“正向触碰”和“负向触碰”）；3）儿童对父母指令的回应（主要分为“服从”、“不服从”和“无机会服从”等）[14,17]。如果父母言语是试图增强儿童的特定行为，明确地教导儿童可以重复做这件事情，则被记为“具体称赞”，例如“你编的故事好有创意。”。而如果父母的言语是针对儿童本身，或儿童的某个特质、活动、作品或选择等不赞同的口语表达，也包括一些无礼的、讽刺的或冒失的言辞，则被记为“负向语句”，如“你做得太慢了。”“你可以停止发牢骚吗？”。当儿童在父母指令给予后的 5s 内服从或者开始服从，则被记为“服从”[17,19]。

2 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在亲子互动干预项目中的应用研究

2.1 *亲子互动疗法* DPICS 作为一种系统的行为观察工具，被用作亲子互动疗法（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PCIT）的辅助工具，是衡量其进展和结果的基本系统。PCIT 由 Sheila Eyberg 团队于 1973 年发布。该疗法整合了游戏疗法、依恋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致力于改善父母养育行为和减少儿童破坏性行为，适用于 3～8 岁儿童家庭[16,24]。对破坏性儿童行为，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25-27]、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25]和焦虑症[28]；以及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干预[29]和在家庭或诊所开展的干预都证明了有效性[30]。

PCIT 所倡导的干预目标与 DPICS 的测量条目直接相关。在具体干预治疗开始之前，治疗师会利用 DPICS 及其他评测工具（如问卷），评估家庭当下的亲子互动现状和儿童外化行为，以制定适用于该家庭的干预方案和目标。DPICS 侧重于通过行为观察，量化积极和消极的养育行为，以及破坏性和不合作的儿童行为。干预分为两个阶段-儿童主导互动（child-directed interaction，CDI）和父母主导互动（parent-directed interaction，PDI）。整个干预治疗以 DPICS 结构化亲子互动游戏为基础展开，在 CDI 阶段，研究人员通过指导家长在 CLP 的参与和互动，让家长学习和掌握 PRIDE 技能（P 表扬，R 回应，I 模仿，D 描述，E 享受），同时忽略儿童一些不适当行为，以创造良好的亲子互动氛围；在 PDI 期间，家长在 PLP 中被教导何时和如何使用有效指令，以减少儿童的不遵守/消极行为。父母还会学习如何处理攻击性行为和公共场合的不当行为。当父母在通过 DPICS 评测的养育技能达到预设目标，PCIT 整个干预结束。DPICS 贯穿了整个 PCIT 的过程，是实施和评估 PCIT 疗效的重要指针[31]。

2.2 *“不可思议的岁月”干预项目* DPICS 也是一款独立的亲子互动观察工具，被用于评估其他亲子互动干预项目的有效性，如由 Webster-Stratton 等[32]开发的“不可思议的岁月”干预项目（Incredible Years Training Series，IY）。“IY”是结合家庭、儿童和学校的因素改善儿童（4～12 岁）行为问题。干预计划采用视频建模、角色扮演、练习活动以及来自治疗师和其他团体成员的现场反馈等形式开展。3 个月和 2.5 年的随访记录均显示，参加 IY 项目的父母养育压力明显减少、儿童的行为问题持续改善，适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家庭[32-33]。DPICS 作为父母和儿童行为变化的有效测评工具，在实际干预项目中，根据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者选用了不同的 DPICS 编码条目对干预前后的父母和儿童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如儿童类别中的“负向语句”和身体的“负向触碰”用作学龄前儿童长期行为问题的评判指标之一[34]，或儿童对父母信息性问题和指令的“不顺从性”用于区别有 ADHD 和没有 ADHD 症状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35]或破坏性行为测量有对立违抗障碍行为（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和

行为障碍(conduct disorder,CD)症状的儿童在亲子互动中呈现的外化行为问题[36]。

2.3　新森林育儿计划和“帮助不听话的孩子”干预计划　行为观察允许对父母和幼儿的行为进行更客观的评估,且能解决幼儿不能可靠地报告他们与父母的互动的问题。而游戏又是儿童早期了解社会和学习社会技能的最主要手段。DPICS 结构化的游戏设计情景很好地融合了这两个功能。因此,也经常作为独立的工具应用于年幼儿童的亲子互动干预项目,如新森林养育计划(the 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 NFPP)和“帮助不听话的孩子”干预计划(Helping the Noncompliant Child, HNC)。NFPP 是针对学龄前 ADHD 儿童,以家庭为基础、依靠父母养育行为作为改变主体的干预项目[37]。HNC 是基于 Hanf(1969)亲子互动理念开发的家长培训项目。其依照社会学习的理论,用于干预有对抗行为和不服从行为的 3～8 岁儿童家庭干预项目[38-39]。NFPP 和 HNC 的干预重点都是增加父母的积极养育行为,从而改善儿童的行为问题。测评结果显示,父母积极养育的自我评价和积极教养行为、通过家长和教师报告的儿童多动症和反抗性行为都有所改善[33,40-43]。干预中,以父母在自由游戏和玩具清理环节呈现的言语(如赞美、批评、命令、回应等)和控制行为(命令等)衡量父母积极养育技能,儿童的顺从性等评估儿童外化行为问题[39-41]。如在玩具清理环节,父母对正在清理玩具的儿童说,“你真是个帮手,你把积木放到了正确的地方。”,因为肯定了儿童的具体行为,被记为“具体赞美”;如父母说,“请继续把剩余的积木放回到这个箱子。”,这是父母在指示儿童做出一种行为,则被编码为“直接命令”。

3　教养行为对儿童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机制与二元亲子互动编码系统

亲子互动干预项目已被证明能有效改善儿童外化行为问题,即全面积极的养育方式(温暖、回应、参与等)是促进儿童亲社会性行为发展的有效因素。干预项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DPICS 如何支持这些机制? 研究清楚这一问题有助于对干预项目和 DPICS 的灵活应用。

3.1　建立亲子依恋　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大多有一段困难的亲子关系史,这也是孕育和加剧行为问题的原因之一。DPICS 在三段序列的亲子互动游戏情景中,将儿童主导游戏 CLP 设为第一个情景,由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亲子互动氛围的开端,让儿童通过在游戏环节中的主导,感知到自己被关注、尊重和爱。在具体干预项目中,PCIT 中引导家长使用 PRIDE 技能(P 表扬,R 回应,I 模仿,D 描述,E 享受)和忽略一些不适当行为;“不可思议的岁月”(IY)培训计划教导父母跟随儿童的游戏节奏、并持续为儿童提供社会和情感支持;HNC 要求家长跟踪和关注儿童的适当行为,忽视其轻微不当行为等。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让家长学习积极养育技能。依据 DPICS 的编码规则,父母的言语行为如“赞美”、“回应”等这些爱和尊重的举动会被作为积极教养行为编码;而“命令”、“批评”、“负向语句”等否定类言语则被作为负面教养行为编码量化。对积极养育技能用客观数据的方式再次呈现,会强化家长持续使用这些策略并面对新的挑战。正是这种积极亲子互动的建构、指导、编码、反馈和认知,使父母和儿童拥有良好且积极的心理感知,在父母和儿童之间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

3.2　调整认知方式　父母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认知方式是指父母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因果解释。如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发生后,父母责备或者惩罚,儿童则争论、叫喊以及以更极端的方式迫使父母退让。这种互动模式不断重复,使父母认为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管教的。而亲子互动干预项目致力于将家长的关注重心从问题行为到儿童的积极行为上,再辅之具体的应对技能,如使用“暂停”键,给其一个冷静的空间;在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的环境(家庭)中,观察并示范游戏策略;和儿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和不良行为后果等[11,30]。DPICS 游戏的结构设计和编码条目,也是在辅助家长进行认知调整:如将儿童主导游戏 CLP 设为第一环,让亲子互动尽可能在儿童更积极的状态下开启。在随后的需要配合家长指令的 PLP 和 CU 环节,儿童有可能有更多的顺从性和合作性。同时通过正向和负向两大类条目的归类和频率统计,让家长除了在互动中真切地感受到亲子活动氛围的改善,也通过量化数据和视频录像的复盘,看到他们的教养策略减少了儿童破坏性行为,提高了顺从性和亲子互动质量,从而让家长摒弃儿童的问题行为是与生俱来、无法管教等消极理念。此外,推进父母倾向于关注儿童的积极行为,并对更多的积极行为做出儿童责任归因(即将儿童行为的转变解释为是基于儿童内在的稳定特征)。由此,最终让父母在亲子互动中更多地关注积极强化,而非将注意力放在惩罚和厌恶性行为上。

3.3　提高自我效能感　父母自我效能感反映父母对养育儿童的信心、态度和自我感知的能力。一项

专门针对家长对亲子互动疗法 PCIT 接受程度的研究显示，家长们认为其效果惊人。最初觉得笨拙和不自然的育儿技巧，通过反复排练和辅导支持变得更加直观和本能。他们看到了儿童行为的快速改善，感觉到他们在亲子互动中的积极和投入，并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了自我效能感[36]。干预计划“不可思议的岁月”（IY）系列中，高阶家长培训计划鼓励父母将自我照顾、养育子女视为个人幸福一部分，帮助父母在与儿童的日常互动中更加积极，减少胁迫和焦虑。家长的这类良好感觉在 DPICS 的 3 个亲子互动结构化（CLP、PLP 和 CU）评测中通过频率统计，被客观地以前后对照的方式量化和证实，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积极养育和改善儿童行为问题的信心，相信自己和儿童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自己是可以处理养育孩子的挑战的。

4 小结与展望

本研究根据 DPICS 的应用研究脉络，梳理了近年来亲子互动干预研究现状。关注儿童行为本身，更关注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推进作用。只有父母自身充满爱与力量、理解儿童行为并对行为积极归因，同时相信自己能对其有所帮助，拥有自我效能感，才能让积极养育行为得以坚持下去。希望本综述能对儿童外化行为问题和亲子互动质量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些许参考。

在未来研究中，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以期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提供更丰富的证据：1）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结合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微环境的不同，梳理出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化行为问题的最佳干预期，以制定出更经济的干预方案。2）聚焦于行为问题的孕育、爆发和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结合家庭系统理论，采用纵向追踪的方法将干预措施与行为问题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干预和治疗。3）将目前已知的有效教养行为干预措施与团体干预治疗、社会支持相结合，研发出更多低成本，有持续效应，同时父母更方便参与的社区模式。4）将外化行为问题与儿童气质类型与生理特征相结合，为特定群体匹配更精准有效的干预方案。

参考文献

[1] Pol ACVL, Frank V, Edward DB, et al. Peer victimization, poo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link between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J]. Child Dev, 2012, 83(11):1775-1788.

[2] Willner CJ, Gatzke-Kopp LM, Bray BC. The dynamics of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comorbidity across the early school years[J]. Dev Psychopathol, 2016, 28(4pt1):1033-1052.

[3] Rivenbark JG, Odgers CL, Caspi A, et al. The high societal costs of childhood conduct problems: Evidence from administrative records up to age 38 in a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7, 59(6):703-710.

[4] 陆辰馨，侵入式教养对儿童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D]. 杭州：浙江大学，2021.
Lu CX, The influence of intrusive parenting on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The role of Cardiac Vagal Regulation[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21. (in Chinese)

[5] Frick PJ, Barry, CT., Kamphaus RW. Assessing family context[M]. //Clinical assess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2020, Switzerland: Springer.

[6] 赵德刚，侯金芹，江兰，等.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6):106-111.
Zhao DG, Hou JQ, Jiang L, et al. A Study on the two-way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J]. J Southw Univ Soc Sci, 2017, 43(6):106-111. (in Chinese)

[7] Calders F, Bijttebier P, Bosmans G,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adolescent outcomes[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 2020, 29(3):327-342.

[8] Hosokawa R, Katsura T. Role of parenting style in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preschool to elementary school according to gender in Japan[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1):21-38.

[9] 姚婷，李会茹，付玺行，等. 父母教养方式、校园欺凌和心理韧性影响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2022, 51(2):192-197.
Yao T, Li HR, Fu XX, et 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school bullying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n adolescent mental sub-health[J]. Acta Med Univ Sci Technol Huazhong, 2022, 51(2):192-197. (in Chinese)

[10] Gardner F, Leijten P, Harris V, et al. Equity effects of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for child conduct problems: A pan-European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J]. Lancet Psychiatry, 2019, 6(6):518-527.

[11] Mouton B, Loop L, Stievenart M, et al (2018). Parenting programs to reduce young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ir behavioral or cognitive orientation[J]. Child Fam Behav Ther, 2018, 40(2):115-147.

[12] Schulz S, Leijten P, Shaw DS, et al. Parental reactivity to disruptive behavior in toddlerhood: An experimental study[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19, 47(5):779-790.

[13] Cañas M, Ibabe I, de Paúl J. Promising observational instruments of parent-child (0-12 years) interaction within the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A systematic review[J]. Child Abuse Negl, 2020, 109:e104713-e104713.

[14] Niec LN. Handbook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Innov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285-302.

[15] Eyberg SM, Nelson MM, Ginn NC, et al.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 Comprehensive manual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4th ed.)[M]. Gainesville, FL: PCIT International: 2013.

[16] Eyberg SM. Manual for the coding of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s of children with behavior problems[J]. Oreg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Oregon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1974.

[17] Eyberg SM, Chase RM, Fernández MA, et al.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 Clinical manual (4th ed.) [M]. Gainesville, FL: PCIT International, 2014.

[18] Cañas Miguel M, Ibabe Erostarbe I, Arruabarrena Madariaga MI, et al.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 Factorial structure and concurrent validity[J]. Psicothema, 2021.

[19] 陳怡群. 親子二人互動紀錄系統第四版之信效度與常模數據報告:建立於台灣臨床轉介樣本[J]. 中華心理學刊民, 109, 2020, 62 (3): 321-354.
Chen YQ.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normative data of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fourth edition in a clinically referred Taiwanese sample[J]. Chin J Psychol, 2020, 62 (3): 321-354. (in Chinese)

[20] Abrahamse ME, Niec LN, Solomon DT,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in The Netherlands[J]. Child Fam Behav Ther, 2019, 41(3): 141-158.

[21] Foote RC.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Ⅱ (DPICS Ⅱ):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ith father-child dyads [M].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9.

[22] Robinson EA, Eyberg SM.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Standardization and validation[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1981, 49(2): 245.

[23] Cañas M, Ibabe I, Arruabarrena I, et al.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 Negative talk as an indicator of dysfunctional mother-child interaction[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22, 143: 106679.

[24] Cotter AM, Brestan-Knight E. Convergence of parent report and child behavior using the Dyad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DPICS)[J]. J Child Fam Stud, 2020, 29: 3287-3301.

[25] Vetter JA.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for autism spectrum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Child Fam Behav Ther, 2018, 40(3): 204-232.

[26] 代美娜, 孙玉梅.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亲子互动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5): 47-53
Dai MN, Sun YM. Research on ear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J]. Chin J Spec Education, 2020(5): 47-53. (in Chinese)

[27] Ros R, Graziano PA. Group PCIT for preschoo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J]. J Child Fam Stud, 2019, 28: 1294-1303.

[28] Phillips S, Mychailyszyn M. A review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 Applications for youth anxiety [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21, 125: 105986.

[29] Hawk BN, Timmer SG, Armendariz LAF, et al. Improving children's behavior in seven session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Parent-Child Care (PC-CARE) for children aged 2 - 10 years[J]. Child Psychiat Hum Dev, 2022: 1-14.

[30] Fowles TR, Masse JJ, McGoron L, et al. Home-based vs. clinic-base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in the context of dissem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J]. J Child Fam Stud, 2018, 27: 1115-1129.

[31] Funderburk BW, Eyberg 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M].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Continuity and Change. 2n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1: 415-420.

[32] Webster-Stratton CH, Reid MJ. The incredible years program for children from infancy to pre-adolescenc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ehavior problems[J]. Clin Handb Assess Treat Conduct Probl Youth, 2010: 117-138.

[33] Sonuga-Barke EJS, Barton J, Daley D, et al. A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and cost of specialised individually delivered parent training for preschool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a generic, group-based programme: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me versus Incredible Years [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 2018, 27: 797-809.

[34] Posthumus JA, Raaijmakers MAJ, Maassen GH, et al. Sustained effects of Incredible Years as a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conduct problems[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12, 40: 487-500.

[35] Webster-Stratton C, Reid J, Hammond M. Social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early-onset conduct problems: Who benefits? [J]. J Child Psychol Psych Allied Disciplines, 2001, 42(7): 943-952.

[36] Webster-Stratton C. Preventing conduct problems in head start children: Strengthening parenting competencies[J]. Consult Clin Psychol, 1998, 66(5): 715.

[37] Thompson MJ, Laver-Bradbury C, Ayres M, et al. A small-sca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revised 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me for preschooler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 2009, 18: 605-616.

[38] McMahon RJ, Forehand RL. Helping the noncompliant child: Family-based treatment for oppositional behavior (2nd ed)[M]. 200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39] Parent J, Jones DJ, DiMarzio K, et al. The Effects of young children's s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on behaviorally observed outcomes in standard and technology-enhanced 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J]. Res Child Adolesc Psychopathol, 2023, 51(2): 165-175.

[40] Dale C, Parent J, Forehand R, et al. 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 for Preschool ADHD: Family-centered profiles predict changes in parenting and child outcomes[J].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22, 51(5): 726-739.

[41] Shimabukuro S, Daley D, Thompson M, et al. Supporting Japanese mothers of children at risk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 small-scale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of well parent Japan[J]. J Child Fam Stud, 2020, 29: 1604-1616.

[42] Kaminski JW, Claussen AH. Evidence base update for psychosocial treatments for disruptive behaviors in children [J].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17, 46(4): 477-499.

[43] Mingebach T, Kamp-Becker I, Christiansen H, et al. Meta-meta-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ent-based interven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chil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J]. PloS One, 2018, 13(9): e0202855.

收稿日期:2023-05-12　**修回日期**:2023-08-16　**本文编辑**:杨媛媛